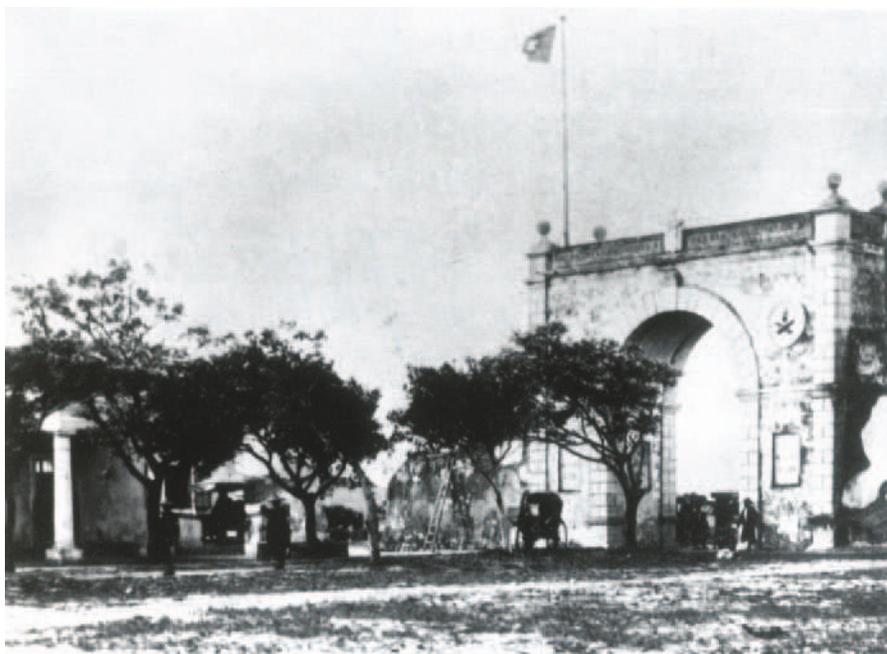


# 辛亥時期香山的革命運動

## 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而作

黃鴻釗\*



1849年澳葡當局所建關閘舊貌

19-20世紀之交，清政府自從鎮壓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簽訂〈辛丑合約〉、實施新政破產後，其腐朽、反動的本質進一步暴露無遺。隨着清政府成為“洋人的朝廷”，近代中國兩大社會矛盾趨於匯流，集中體現為中國人民同清朝政府之間的矛盾，國內的智識分子更感受到中國正面對前前所未有的危機，革命的時機成熟了。

武昌起義一聲炮響，拉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革命形勢迅速蔓延全國；而這次革命在香山的反應，則更為熱烈和深入。這是因為，香山海洋文化發達，對外開放最早，受西方文化影響較大，人民更加渴望變革。香山啟蒙運動開展較早，民主革命的理念在這裡更為深入人心，革命的群眾基礎較為深厚。香山是中國人最早出洋留學的發源地，留學人員思想先進，同盟會員眾多，先鋒作用突出。香山又是著名僑鄉，海外華僑普遍對革命熱烈響應和支持。駐紮前山的廣東新軍積極回應革命，並成為推翻香山舊政權的主力軍。由於以上諸因素，香山革命雖與全國各地都大致相同，但又有其特殊性。

\*黃鴻釗，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澳門史專家。

## 香山人民渴望變革 革命群眾基礎深厚

一、香山是最早通過澳門而與西方接觸，從而也是受到西方影響較早的地區。香山位於南海之濱，具有優良的海洋地理環境，人民很早就出洋發展，通番貿易。沿海先後形成浪白澳、濠鏡澳和十字門等走私貿易港口。其後濠鏡澳和十字門合稱澳門。1553-1557年間，葡人入居澳門，此後四百年，它成為外國人居留和對外開放的貿易特區。澳門開埠以後，隨着港口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繁榮，迅速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作為一個國際貿易港口、中外商品的中轉站，澳門聚集了當時歐、亞、非、美等洲大約十多二十多個古代國家的商人。其中有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國、法國、荷蘭、俄國、丹麥、意大利等國；美洲的美國；非洲東部的索馬里；亞洲的阿拉伯半島、印度半島、印尼群島、馬來半島、中印半島、菲律賓群島和日本群島的古代國家。於是澳門成為古代中國罕見的多元文化港口城市。澳門是香山的一部分，澳門的居民除了一部分海內外商人之外，大半仍是香山人。他們通過澳門最先接觸西方先進文化，大大拓寬了自身的文化視野，豐富了其物質文化生活。這裡的人民思想開放，關心時政，強烈要求變革和創新，堅決告別因循守舊和固步自封的陋習，從而形成一種銳意進取、敢於創新、敢於開風氣之先的文化精神。香山人通過澳門接受了西方傳入的新思想、新文化的資訊，使香山革命思潮較諸其它地方更為活躍，成為民主革命的家鄉。正因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在革命動盪年代裡，香山人具有勇於創新、敢於革命的精神。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當時民智閉塞，在清朝統治者淫威壓迫之下，響應興中會號召，起來造反的人寥寥無幾，許多人“聞總理有作亂謀反言論，咸謂足以破家滅族，雖親戚故舊亦多掩耳卻走”<sup>(1)</sup>。可是香山人卻踴躍報名參加革命。據《革命逸史》作者馮自由記載，興中會初期的會員共有二百八

十六人，其中香山華僑會員九十八人<sup>(2)</sup>，佔三分之一以上，他們都是在檀香山入會的。

香山革命者胸懷壯志，英勇鬥爭，獻身革命，敢於犧牲。陸皓東就是其中突出的一個。陸皓東(1868-1895)，香山縣翠亨村人，孫中山少年時代的好友，曾與孫中山一起為破除村民迷信搗壞北帝神像而被逐，後第一批加入興中會。1895年與孫中山共同策劃了廣州起義。陸皓東在此役中壯烈犧牲，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捐軀報國、為共和革命而犧牲的第一個香山人。就義前，他撰寫了“絕命書”，慷慨陳述，大義凜然：

吾姓陸，名中柱，號皓東，香山翠亨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與同鄉孫文同憤異族政府之腐敗專制、官吏之貪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憑弔中原，荊榛滿目。每一念後，真不知涕淚何從也。居滬多年，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之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為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蓋務求驚醒黃魂，光復漢族。無奈貪官污吏，劣紳腐儒，醜顏鮮恥，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澤，即曰我輩踐土食毛。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擄我子女玉帛。試思誰食誰之毛，誰踐誰之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與夫兩王入粵，殘殺我漢人之歷史尤多，聞而知之，而謂此為恩澤乎？要之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族，非誅除滿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故吾等尤欲誅一二狗官，以為我漢人當頭一棒。今事難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盡殺。公羊既歿，九世含冤，異人歸楚，五說自驗。吾言盡矣，請速行刑。

陸皓東曾親手創制“青天白日旗”為革命軍旗。其後，孫中山將青天白日旗定為國民黨

旗，又將青天白日旗加上紅色底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以此旗作為中華民國國旗，以紀念陸皓東及興中會諸烈士流血獻身的精神。

從廣州起義開始，革命黨人陸續舉行十次起義，每次都有香山人參加，他們充分表現出前仆後繼，勇往直前的革命大無畏精神。

二、香山是中國人最早出洋留學的發源地，留學生思想先進，參加同盟會人員眾多，先鋒作用突出。

1) 香山人留學起源很早。1645年澳門人鄭瑪諾前往羅馬留學，是為中國近代前往歐洲留學第一人。鄭瑪諾號惟信，祖籍廣東香山縣，1623年生於澳門。1645年十二歲時隨同陸德神父赴羅馬深造。他們從澳門乘船出發，經馬六甲、爪哇、果阿、波斯、亞美尼亞和土耳其等地前往歐洲。途中遍歷艱險，歷時五年才抵達羅馬，進入聖安德勒學院修讀。1653年加入耶穌會，並轉入羅馬公學學習修辭學、邏輯學、物理化學、音樂和外語等多門課程。畢業後居留羅馬，教授拉丁文、希臘文法與文學。三年後轉赴歐洲各地學校任教。至1671年返回澳門。這時他已三十八歲。同年應召入北京朝廷供職，可是他已身患嚴重肺病，終於在1673年5月26日病逝。鄭瑪諾遊學歐洲二十六年，經歷豐富，知識淵博，是一個西學素養較高的學者。回國時正值康熙皇帝廣納賢才之際，可惜他英年早逝，未能施展所學，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應有貢獻。

鄭瑪諾之後，陸續有人被澳門教區派遣出國深造。這項工作一方面由澳門聖保祿學院從學員中挑選，另一方面由傳教士在各省挑選，推薦至澳門教會，再啟程赴歐。1732年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在其家鄉那不勒斯創辦了一所中國學院。該學院的主要目的是為羅馬教廷培養遠東傳教人材。學院不僅接納中國留學生，凡有志來遠東傳教的西人或土耳其人，均可入學修讀。學院至1868年停辦。據統計中國學院辦學一百三十六年間，先後就讀的中國留學生達一百零六名。以當時的形勢而論，這個數字已相當可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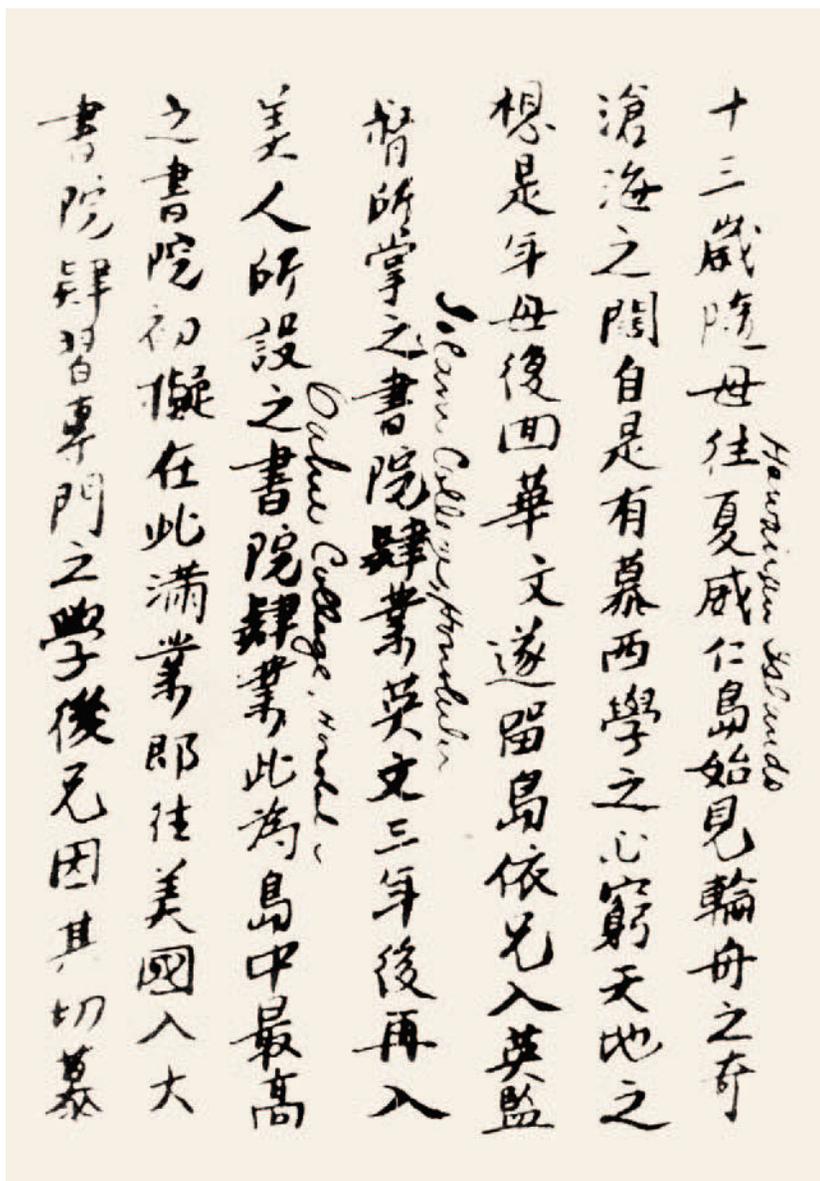
2) 容閔和香山留美幼童為民國貢獻了人材。鴉片戰爭以後，香山人容閔是新時期出國留學的代表人物。容閔(1828-1912)字達萌，號純甫。香山南屏鄉人，少時移居澳門。1841年入澳門馬禮遜學堂讀書。1847年赴美國留學，1854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sup>(3)</sup>

容閔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極度貧窮落後，亟待從衰弱中奮起之際，因此他肩負着向西方先進科學知識學習的歷史使命。自從留學美國畢業回國之後，他四處奔波，為謀求中國近代化貢獻力量。他致力於改變祖國的貧窮落後狀況，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振興經濟，引進先進機器，發展民族工業。

從1870年起，容閔首倡和主持了中國官派青少年出國留學事業，開創了中國近代留學教育的先河。在他親自組織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中，香山籍的佔三分之一。這些人後來回國，在清末民初中國政壇或經濟文化建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當年曾國藩和李鴻章在策劃幼童出洋這一“千古未有之奇事”時，期望這些出洋學生在掌握了西方科學技術後，可以幫助中國漸圖自強。所以，當留美學生被遣送回國後，李鴻章把他們安排在一些重要部門。第一批二十一名學生回國後，立即被送入電報局學習電報；第二、三批學生中有二十三名分別被當時中國的先進企業如福州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留用，其餘五十名分赴天津水師、機器、電報、魚雷等局處當差。這些留美學生學問紮實，精通外語，聰明能幹，又有報國之心，因此他們大多得以脫穎而出，成為清末民初急需的外交、軍事和建設的棟樑之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作出了貢獻，有的還在反侵略戰爭中為保衛祖國壯烈犧牲。

辛亥革命爆發後，留美幼童與時俱進，反戈一擊，反對清朝，為民國効力，成為革命營壘的成員。其中最有名的是唐紹儀和容星橋。唐紹儀(1862-1938)是第三批留美幼童，後入哥倫比亞大學文科；回國後出使朝鮮，後任天津海關道；1904年以外務侍郎赴印度與英國談判，



孫中山1896年11月致友人翟理斯手迹。信中憶述了自己第一次離鄉到海外的感受：“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維護中國政府對西藏的主權，功不可沒；清末參加南北議和，民國初年擔任第一任內閣總理；年過古稀仍任香山模範縣縣長，政績卓著。容星橋（1865-1933）是容闈的侄子，為唯一參加了興中會和同盟會的留美學童，1904年主持香港《中國日報》，宣傳革命；辛亥革命後，曾任廣東政府交通司副司長。

此外，進入民國後，唐紹儀的好友和親家梁如浩曾任外交總長，唐國安（1858-1913）任清華學堂（今清華大學）校長。蔡紹基（1859-1933）北嶺人，曾任山海關監督、北洋大學校長。蔡廷幹（1861-1935），上柵人，曾任海軍副司令。唐元湛（1861-1921），民國首任電報局局長。他們都是香山留美學生的傑出代表。

3) 20世紀初香山留學生是革命的中堅力量。當時劉思復、劉樾航、鄭彼岸、鄭道實、蘇曼殊、林君復、鄭仲超等香山人出洋留學，接受西方教育，把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理念帶回國內，對於中國民主革命思潮的興起和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成為辛亥革命的中堅力量。其中劉思復的思想尤其激進。早在1902-1903年間，具有民族革命意識的劉思復、鄭貫公、鄭彼岸等在石岐創辦香山閱報社。1904年劉思復創辦雋德女學堂。其後劉思復、鄭彼岸等七人在日本東京結識孫中山，參加

了同盟會，並奉命負責策劃香山起義。

劉思復等人回國後，與鄭彼岸在石岐創辦《香山旬報》，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聚集一批革命同志，進行革命的宣傳工作。林君復則在澳門創立“仁聲”劇社（又稱“醒同仁”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林君復與林壽愷、張若屏等為了創辦劇社，變賣產業籌得兩萬元作經費，聚集

在澳門南灣41號開展活動，排演劇碼，揭露清廷腐敗、禍國殃民的罪行，以激起同胞的愛國熱忱。劉思復則除了參與鄭彼岸辦《香山旬報》，又在香港辦《東方報》，寫了許多論著宣傳革命。1907年，廣東水師提督李準血腥鎮壓了廣東黃岡、七女湖起義後，革命黨人便決心採取暗殺手段對付兇惡敵人，以重振革命信心。劉思復在廣州同汪精衛、胡漢民等黨人議定暗殺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劉思復負責執行。是年6月16日，劉思復在寓所試製炸彈，不慎爆炸受傷。四鄰受驚，員警聞訊趕來。在檢查現場時，發現床底下籃裡貯放着兩枚炸彈，便懷疑劉思復是革命黨。審訊時，儘管劉思復矢口否認，除炸彈外，也無任何旁證，仍被判押解回香山縣監禁。兩年當中，鄭彼岸和知識界知名人士數百人“聯名稟保數十次”，加以香港同盟會馮自由等人通過華僑記者陳景華溝通廣東官紳，向李準求情，終於使劉思復在1909年12月10日獲釋。<sup>(4)</sup>他出獄的一天，人們擁到監獄門口去迎接，還舉行了歡迎宴會，將劉思復比諸匈牙利民族英雄科蘇特，盛贊劉思復的革命精神。該報評論指出：

吾以為邑人歡迎劉君之本意，必由愛國思想而發生。昔其入獄也，則曰吾國民斷一右臂也，今其出獄也，則曰吾國民得一助力也。

夫歡迎劉君之意，當屬於希望的而非僥倖的，屬於將來的而非現在的。蓋邑人皆當以愛國自勉，而更以愛國望劉君也。噶蘇氏（按匈牙利民族英雄，今譯科蘇特）之出獄也，義俠之多加利民，爭起而迎之，而噶氏卒能奮厥雄心，脫離異族羈轡之下，建獨立自由之匈加利，以謝匈加利之人。今劉君之能志噶氏之志，行噶氏之行，為國効力，無有貳心，（……）斯不負歡迎之盛意矣。劉君其勉之，歡迎劉君者其共勉之。

劉思復出獄後，立即投入革命運動中。次年春，他又在香港組織同盟會的“支那暗殺團”，

團員有劉師復（香山）、李熙斌、朱述堂、高劍父、謝英伯、陳自覺、丁湘田、程克、鄭彼岸（香山）、鄭佩剛（香山）、林冠慈、李應生等人。1911年廣州起義失敗後，為了打擊清政府的反動氣焰，劉師復領導“支那暗殺團”於該年秋，派林冠慈炸傷提督李準，李沛基（李應生之子）炸死欽差大臣鳳山，使敵人聞風喪膽。1911年夏，因汪精衛行刺攝政王失敗，劉思復又與鄭彼岸等北上繼續謀刺攝政王戴澧；後因南北和議，清室退位而中止。

三、香山又是著名的僑鄉，華僑熱愛祖國，全力支持革命。華僑在海外飽受壓迫和剝削，生活和生存的權益得不到保護；他們在國內則被作為“化外之民”而被鄙視。所以，華僑都懷有“排滿”的濃厚情緒，希望祖國富強，能支持保護海外赤子。這一思想願望，是華僑產生革命力量的根源，也是孫中山能夠在領導民主革命全過程中取得華僑支持的主要原因。孫中山說過，“華僑是革命之母”，“每次起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sup>(5)</sup>。檀香山是辛亥革命的海外發源地。據《檀山華僑》資料統計，1896年檀香山有華僑21,609人，他們與國內封建勢力聯繫較少，蘊藏着較強烈的反清情緒。而且那個地方有較多的言論和行動自由，有利於革命的宣傳發動。特別是孫中山曾在那裡生活了五年，有其特殊的社會基礎。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建興中會，提出了“振興中華，挽救危局”、“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綱領。香山華僑熱烈支持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國，踴躍報名入會。他們行動堅決果敢，參加武裝起義，灑熱血、擲頭顱，義無返顧。如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後，為培訓武裝起義人材，孫中山組織華僑志願兵操隊，有香山華僑李杞、侯艾泉、許直臣、宋居仁、陳南、陸燦等人參加。不久，宋居仁、李杞、侯艾泉、陳南回國參加第一次廣州武裝起義。起義失敗後，清政府通緝六人名單中，香山人佔四人。

出錢資助革命的華僑首推孫眉。孫中山成立興中會，其兄長孫眉第一個讚成。孫眉（1854-



鄭觀應著《盛世危言》



鄭觀應 (1842-1922)



楊仙逸 (1891-1923)



容闈 (1828-1912)

1915) 在檀香山經營牧場，家底殷實。當時興中會收取會員費每人五圓，會股銀每股十圓。孫眉認股二百股，一人集資千圓，而其他會員所集股資亦僅千圓。孫中山急於返國從事廣州起義，所需之款遠遠不止此數。於是孫眉以每頭牛牲六七圓之價，賤售一部分牛，得款二千美圓，以充義餉。參加興中會的香山華僑，與孫中山有戚誼關係的程蔚南，亦盡數變賣其商店及農場，傾家支持革命，共得款六千餘美圓。190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發行軍用債券，此時孫眉的收入雖遠不如前，但仍帶頭變賣一千頭牲畜認購。總計他先後捐助革命經費數十萬圓。<sup>(6)</sup>在孫眉的帶頭支持和推動下，孫中山在檀香山籌款得以順利開展。

鄭仲(1859-1922)，南屏人，與孫眉合辦畜牧場，1878年結識孫中山，後參加興中會，並與孫眉一起把他們的畜牧場變賣，供革命起義經費。

旅美華僑陳耀垣原籍香山斗門人。1909年底，孫中山由英抵美，在士得頓組織同盟會分會時，陳耀垣首先響應參加，並把經營的“德和商店”和自己所有財產賣掉，作為革命經費；後隨孫中山走遍美國各地，向廣大華僑宣傳，為革命募集大量款項，為辛亥革命作出貢獻。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時，陳耀垣出任孫的秘書長。

旅澳大利亞華僑孫智興，原籍香山井岸人。他積極動員華僑捐款，支持民主革命。孫對他非常器重，多次委任其為香港及海外籌餉委員。

旅美華僑李君勤，原籍香山南朗人，積極捐款資助。其子李祿超畢業於美國一所大學，早期加入興中會，曾擔任孫中山的英文秘書。

香山華僑踴躍捐助，為革命籌集經費。據有些學者分析估計，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至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期，華僑捐款700-800萬圓(港幣)之多。此外，還認購了各種債券，其中僅檀香山一地華僑先後捐助美元8,000圓，銀洋63,255圓。

旅美華僑楊仙逸(1891-1923)，香山北台人，一家三代都是愛國者。父親楊著昆，早年在檀香山經營糧食生產、銷售以及房地產業而致富

發家。楊著昆是孫眉的摯友，對孫中山革命主張十分讚同，也是早期同盟會員。他不僅多次捐獻鉅款支援孫中山，而且積極回應“航空救國”號召，於1913、1918年先後成立“中華飛船公司”、“圖強飛機公司”。後來，孫中山為加強軍力，掃除軍閥，挽救共和，在華僑中募捐飛機，楊慷慨獨資捐贈飛機四架。楊老太夫人不但鼓勵兒子竭力捐輸，幫助孫中山建立飛機隊，還鼓勵其孫楊仙逸跟孫中山盡義務於國家。楊仙逸1919年回國參加孫中山聲討袁世凱的鬥爭，出任航空局長，在討龍濟光戰爭中駕駛戰機立下赫赫戰功，被授予中將軍銜。

香山華僑積極創辦各種革命報刊，運用輿論工具宣傳革命思想，喚起民眾。1903年，香山華僑程蔚南積極貫徹孫中山的決定，把他創辦的中文報紙《隆記報》改為革命黨報。孫中山“親撰論文與保皇報大開筆戰，揭露康有為的保皇派面目，使華僑迷夢漸醒，興中會因之復興”。1910年，孫中山之子孫科在《自由日報》擔任編譯，進行革命宣傳，寫過〈揚州十日〉、〈文字獄〉、〈焚書〉等文章，後曾任孫中山大元帥機要秘書和廣州《英文時報》主編。旅澳華僑馬應彪(1860-1944)，香山沙涌人，是先施公司創始人。他抱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思想，回國跟隨孫中山奔走革命。為了喚起民眾，他在省港澳渡輪中以唱聖詩傳教為名，宣揚孫中山的革命主張。辛亥革命後，他曾任大元帥府庶務長。

此外，檀香山華僑唐雄(1865-1958)，任檀香山華美銀行總經理，為了支持孫中山革命，他散盡家產，欠下銀行大筆債務。陳席儒(1859-1936)，華僑鉅賈陳芳之子，1890年與其兄陳賡虞資助孫中山一百萬港幣創辦《中國日報》。陳芳之孫陳永安是同盟會員，出錢出力，熱心支持香山起義。郭標(1868-1931)，百貨鉅賈郭樂堂兄，澳大利亞華僑領袖，上海永安百貨公司創辦人，積極支持孫中山革命活動，協助建立國民黨澳大利亞支部和創辦《民國報》。馬玉山(1878-1929)，企業家，積極捐款支援孫中山革命。還有



陸皓東 (1868-1895)

香山旅日華僑、音樂家蕭友梅，畫家和文學家蘇曼殊，他們都是辛亥時期非常傑出的革命志士。

### 澳門是香山革命者的活動基地

一、啟蒙思想家鄭觀應在澳門完成了他的名著《盛世危言》。

辛亥革命前夕，在中國大陸極端專制的政治環境下，人民不能集會結社，難以公開發表意見，因此中國革命黨人最初的政治活動是從國外開始的。而香港和澳門既是中國的國土，當時又在外國人直接統治之下，遂成為革命人士密謀策劃行動的最好基地。特別是香山的革命指揮中心更是設在澳門。

當時澳門是文化交匯的港口城市，也是中國新文化、新思潮的發源地之一。近代辛亥革命時期，它又是各種進步思潮匯聚、革命情緒激蕩的地方。由於西方新文化的傳入和促進，明季中國就出現了一些改革家，如徐光啟、李之藻等人，

他們通過各種管道與澳門聯繫，企圖利用西洋科技富國強兵。及至近代，中國一些愛國的、追求改革和革命的人士，也很重視研究澳門，並以澳門為其活動舞臺。

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鄭觀應，1842年7月24日出生於香山縣雍陌鄉，出生不久鄭氏舉家遷至澳門，在澳門購置房產，建造鄭家大屋，長期居住，成為澳門居民。其父鄭文瑞至1893年因病辭世，終年八十二歲。繼母也於1906年病故。鄭觀應出生後隨父母到澳門生活，入塾讀書，至1858年十六歲時，在香山應童子試未中，奉父命離開澳門到上海學賈，從此長期在外經商做官，活動於滬穗等地，但仍常常返回澳門探親。

1885年，鄭觀應經商虧欠，事業受挫，遂返回澳門隱居多年。他在住處潛心寫作，輯著《盛世危言》和《中外衛生要旨》等書，1890年出版了《中外衛生要旨》；四年之後，另一部五卷本巨著《盛世危言》終於在澳門問世。這是鄭觀應的代表作，閃爍着他的先進革命理念的光芒。他在書中寫道：

有國者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在這裡，鄭觀應以其簡潔的語言，嚴密的邏輯，正確地論證了強與富之間的關係，指明了中國登於富強之境的必由之路。

鄭觀應激情四射的先進革命理念，發散出非常強大的思想魅力，吸引着許多先進的中國人去思考、去學習，為中國的奮起而鬥爭。毛澤東青年時代就曾深受鄭觀應的影響，他說：

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這本書我非常喜歡，(……)激起我想要恢復學業的願望。



黃勝 (1827-1902)



林君復 (1879-1942)

同為香山人的年輕的孫中山穿梭往來澳門，深受新思潮影響，立下革命志向。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求學時，每逢假期由香港回家，必經澳門與鄭觀應交談對時局的看法及研習西方之主張。兩人來往密切，志趣相投。通過廣泛的交流，受到維新思想的啟發，又得到一些反清好友的鼓勵，使孫中山堅定了改造舊中國的決心。1890年，孫中山曾致函同鄉洋務派官吏鄭藻如，建議在本縣倡行振興農桑，戒絕鴉片，遍設學校，再向各地推行。〈致鄭藻如書〉是孫中山早期改良主義作品之一。1891年前後，孫中山撰寫了〈農功〉一文，闡述了他對改良農業的看法，文章建議清廷“派戶部侍郎一員綜理農事，參倣西法”；派員出洋考察，學習西方“講求樹藝農桑、養蠶、牧畜、機器耕種、化瘠為腴一切善法”，回國加以推廣，並強調“以農為經，以商為緯，本末備具，巨細畢駭，是即強兵富國之先聲，治國平天下之樞紐”。〈農功〉一文被鄭觀應收入《盛世危言》。鄭觀應在編著《中外衛生要旨》時，曾

得到過孫中山的幫助，復在該書〈序言〉中提出“中西醫相結合”的見解。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也曾引用了鄭氏“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的觀點。1894年，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時，亦得到鄭觀應引薦給另一位著名維新思想家王韜。王韜當時任上海格致書院院長，與孫中山一見如故，幫助孫中山潤飾〈上李鴻章書〉一文，又向李鴻章文案羅豐祿引薦。同年6月，孫中山與陸皓東由澳門到天津，在“佛照樓客棧”會見羅豐祿，羅並委託同事徐秋畦向李鴻章呈送孫的萬言上書。可是李鴻章沒有採納孫中山的救國大計，使孫中山消除了改良主義的幻想，決然開拓民主革命道路，用革命手段來傾覆清廷的腐敗統治，以實現振興中華的目標。

二、孫中山與四大寇早期在澳門的革命活動。

孫中山的父親孫達成，早年在澳門當過鞋匠，少年時代的孫中山常隨父母往來澳門與家鄉之間。1878年，孫中山十三歲的時候，隨母親到

出金錢多枚、金器數件、謂此係走私漏稅、議作五百元處罰、孫某與之爭辯、要向稅務司查明有此等稅則、乃甘罰款、該員不由分說、竟先取去伊銀一百五十元為質、如經該司判準免罰、即將所質之銀交還云、

◎居然掃興 四都岐山麻子等鄉、於初九日慶祝北帝誕、是晚燃放花炮、及昇偶像巡遊、忽抓船防勇報告、謂有匪二百餘人、潛伏於浦口門外、鄉人聞耗、立即收拾儀仗鑼鼓、紛携大炮分置要隘、各荷長鎗巡邏、至四更尙無行劫消息、始行散歸云、

### 革命軍佔領邑城詳紀

十五日聞有革軍千餘人在小樓沙、是日上午、邑令會同李都司及游擊隊前往巡視、甫到即見革軍將由省駛回之鴻昌小輪追擊、李都司及游擊隊便放鎗與戰、是時有湖南勇四十名當先衝鋒、聞被鎗斃六名、走回八名、其餘不知下落、游擊隊管帶梁守之部勇斃一名、傷一名、李都司幾為所困、是晚入黑時候、邑令與李都司及游擊隊陸續回岐、翌晨馬協乘坐安香小輪出巡及上午

新聞 (七三)

### 新聞

(七四)

時候、即有革軍在隆都隆勝卡地方、將拖帶江門渡之金馬輪船騎駛、所過隆都各卡、盡將槍枝彈子取去、及至疊石地方、始將該輪放回、隨即陸續分隊由隆都渡頭來岐、直入西門城、沿途絕不驚擾、商民貿易如常、各均燃放爆竹、歡呼不絕、是時各營勇及縣署巡勇游擊隊等、均表同情、各衛署巡警局及城樓等、均堅獨立旗幟、各商戶亦多有堅立者、隨有革軍一隊進縣署、在東倉為縣署巡勇什長閔某所阻、即為革軍鎗傷、閔係湖南人、又有革軍一隊、由南門入城、城樓上有營勇數人、放鎗抗拒、即為革軍鎗斃三人、傷三人、聞均湖南人、又邑令聞耗、預携眷屬、奔避于洪紳名宣家中、隨由革軍分隊、駐守各街、保護人民、即出示云、本縣奉行天討、佈告同胞親愛、滿洲以胡亂華、已及二百年外、罪惡貫盈至今、勢如土崩瓦解、各省義師雲起、均是為民除害、還我大好山河、驅逐滿胡出塞、建立共和民國、同胞幸福有賴、本縣堅旗起義、人人歡欣稱快、士農工商男女、照常作業毋懈、到秋毫無犯、不令商民受碍、倘有民騷擾、定予嚴懲不貸、隊紀律明嚴、爾等毋相驚駭、中華民國

粵◎司令部長佈告、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日、并刊派傳單、通請邑中紳商各界、於五點後鐘、在清鄉善後分所集議、及會議時、各界到者甚衆、并邀同軍令在場、隨議定暫借清鄉善後分所、為辦事所、仍推軍署為民政部部长、及議定臨時幹事員數十人、俟將各部組織完善、再行分部辦事、旋即分派各、駐守縣屬各扼要地方、并即分派四人往各當道地方演說、安慰居民、當革軍圍進縣時、所有監獄及刑事所工藝廠各人犯、盡將脚鍊扭鬆、意欲逃脫、後由軍善言撫慰、始行無事、又聞哨弁張德潤、已為革軍破腹拋棄河中、又由司令部長宣布戒嚴令云、(一)民間可供需之諸物品、一概禁止輸出、(二)民間所有鎗砲彈藥、兵器火具、及其他涉於危險之物、本司令部得因於時機沒收之、(三)郵信電報、暫行停止、并斷絕海陸通衢之交通、(四)本司令部、依於戰狀、不得已時、得破壞人民之動產不動產、(五)寄宿于戒嚴地域內者、本司令部因於時機、可使退出、(六)行政之事、皆歸司令部處理、(七)司法之事、由司令長擇判事檢事行之、(八)集會新聞雜誌等、本

新聞 (七五)

### 新聞

(七六)

司令部認為於事勢有妨碍者、得禁止之、中華民國粵◎司令長、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十六日云、(以◎代軍)

### 中外新聞

政界之張皇如是(本省)初八晚督院一聞有堅獨立旗幟、恐有匪徒乘機竊發、立飭全部一律戒嚴、並將華寧里口、用石砌作砲台形、又於轅門外架起機關砲、各情已紀前報、惟昨經訪員再往調查、該關口仍然有石堆砌、尙未毀去、又衛邊街口、則用大坭磚、在關口兩旁堆砌、砌至四五重、高三尺餘、中留二尺、以便行人、華寧里口則撬取街石、在東便關脚、砌至一尺餘高、以便遮身、其後樓房口亦然、(該處可以照應鎮都司令處)計現在督署四圍如前則寺前街、後則厚祥街、左則新豐街、右則洛城街、及本署轅門頭宜門、東西甬北四望樓、日夕分派桂軍、常川梭巡、晚則加班放飄、望樓則打燈遠射、署旁箭道、則駐紮衛隊、另派營哨週圍梭巡、再於黃黎巷尾之舊公平攤館、駐紮桂

美國檀香山跟哥哥孫眉生活，也是先到澳門坐輪船到香港，再轉到檀香山的。在澳門，孫中山“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1884年夏，孫中山十七歲時回國，在村中反對迷信，與好友陸皓東一起損毀了村中北帝廟的神像，為鄉紳所不容，便經澳門到香港讀書。從1885-1890的五年間，孫中山常於課餘假日到澳門、廣州等地，發表反清言論，與同村鄰居楊鶴齡、同學陳少白、朋友尤列等相交最密。在澳門水坑尾巷14號楊鶴齡家中，一起抨擊清朝政府的腐敗，鼓吹革命救國，公開提出“勿敬朝廷”的口號。孫中山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的鼓吹，常來往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遊，聞言吾言者，不以為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為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往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之間戚友交遊，皆呼“四大寇”，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sup>(7)</sup>

他們在澳門經常聚會的水坑尾巷14號，由此此宅被稱為“楊四寇堂”。

1892年秋，孫中山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隨即在澳門康公廟前創設中西藥局，懸壺濟世。由於孫中山醫術高明，病人藥到回春，很快成為當地遠近知名的醫師。他托跡行醫，開展革命活動，在其中西藥局中贈醫施藥，義務行診，不收診金。所需費用由澳門巨紳吳節薇署名擔保，向鏡湖醫院借銀兩千圓，五年歸還。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期間，結識了許多富商和紳士，其中具有較高聲望的為何穗田、盧九、蕭瀛洲、吳節薇、陳席儒、陳庚如等人。但盧、蕭二人為煙

賭鉅賈，向以交結中外官宦為光耀，對革命不反對也不支持；二陳是香山人，檀香山華僑鉅賈陳芳之子，思想開明，同情革命，曾參加反抗澳葡擴張澳門界址的鬥爭；何、吳二人思想先進，熱心愛國，吳更是楊鶴齡的妹夫，但二人思想傾向於較溫和的改革，而不讚成激烈的革命，雖與孫中山交情較深，但政治上都不算志同道合。<sup>(8)</sup>當時祇有孫中山少年時代的同村好友陸皓東、楊鶴齡、楊心如等常往來澳門，與孫中山暢談時政。這個小群體成員後來成為中國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的進步活動，在近代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不但宣傳革命，而且商討組織革命團體，策劃武裝起義的秘密機關，名義上是以“醫學問世”，實是集結同志，籌謀組黨，準備“造反”。後來孫中山為了更好地推動革命運動，決定離開澳門這個小地方，前往省城廣州開設東西藥局，繼續開展革命活動。

三、香山革命者在澳門建立同盟會機關。

辛亥革命前夕，隨着民主革命派組織的建立和綱領的制定，對開展革命活動基地的需求愈來愈感到迫切了。當時，無論是清朝統治下的內地，還是遠處海外的檀香山和東京，都不可能成為國內革命活動的基地，最後革命黨人選擇了香港和澳門。

澳門雖連接大陸，但因其處在葡萄牙人的管治之下，政治、經濟、文化都與內地大不相同。清朝的苛政在這裡起不到作用。基於這些特殊條件，使澳門成為革命派活動的秘密通道。孫中山遷居廣州後，在澳門建立的中西醫局成了革命黨人的活動據點。1895年1月，孫中山到香港與陸皓東、楊鶴齡、楊衢雲等籌備成立香港興中會，對香港和澳門的民眾進行革命宣傳。同年重陽節，孫中山領導廣州第一次起義，因事機不密，叛徒告發，不及起事，10月27日，陸皓東等五十餘人在廣州被捕，慘遭殺害。事發當晚，孫中山越城逃出廣州，乘煤汽艇經順德、香山抵達澳門下環正街，找到葡人朋友飛南第。此時，飛南第已從澳葡當局獲悉清廷懸賞緝拿孫中山等人，立即設

法安排孫盡快離開澳門。為求安全，飛南第陪同喬裝打扮的孫中山一起乘船轉移香港，避過了清廷的耳目。30日，孫中山偕鄭士良、陳少白離開香港赴日本。從此，開始了他職業革命家的生涯。

孫中山很重視香港和澳門作為革命基地的作用。當1905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時，他即簽發委任狀，指派馮自由、李自重至香港聯絡陳少白、鄭貫公等建立香港、廣州、澳門等處同盟分會。委任狀全文如下：

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孫文特委託本會會員，馮君自由、李君自重二人在香港、粵城、澳門等地聯絡同志。二君熱心愛國，誠實待人，足堪本會委託之任。凡有志入盟者，可由二君主盟收接。特此通孫中山給同盟會員馮自由、李自重的委任狀 知，仰祈察照是荷。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孫文押(印)天運乙巳年八月十日發。<sup>(9)</sup>

1907年香港同盟會分會會長馮自由派遣劉樾航、劉思復主持澳門和香山兩地同盟會事務。聯絡點分別設在澳門荷蘭園和隆街21號樂群書室、香山石岐西門外武峰里書報社。後來劉思復獻出澳門自己的房子用作同盟會支部的會址。

自從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舉旗反清之日起，澳門同胞就給予大力支持。興中會組織初期，很多主要人物如陸皓東、楊鶴齡、楊心如等均為孫中山的香山同鄉，常往返於香山與港澳之間。他們在澳門也有很廣的社會關係，因此，一批批澳門的愛國志士追隨孫中山參加興中會（後為同盟會），成為革命黨的一員。參加者來自社會各階層，有學生、商人、職員、教師、工人等。孫中山早年在澳門行醫時，就得到澳門紳商吳節薇為其擔保向鏡湖醫院借錢開辦醫藥局贈醫送藥。1897年，孫中山借款的揭單到期，但此時他早因革命流亡海外，吳節薇就替孫中山還清借款及利息。吳節薇是澳門一位社會名流，他同情反清，熱心支持革命。

由於同盟會員出色的通俗宣傳和深入工作，革命主張就一天天地在澳門深入人心，有不少學生還走出課堂，加入革命隊伍，如馮秋雪、古桂芬、區韶風等。與此同時，林君復等人又成立濠鏡閱書報社，以此作為聯絡群眾及活動的據點，並向社會各界發動籌款捐書供群眾借閱，公開吸收社員。在濠鏡閱書報社舉行成立大會的當天，澳門女同盟會員趙連城向二三百名與會者作反清革命、提倡女權之演說，創澳門女子演說鼓吹反清之先河。當時康有為弟子陳子褒開辦的子褒學塾中，亦有許劍魂、梁國體、陳秉卿、尹淑姬等多名女生加入了同盟會。

1911年8月（辛亥年閏六月），培基學堂女學生梁雪君的養母貪圖金錢，與媒人串通擬騙梁遠嫁新加坡為人妾。時為培基學堂校董兼義務英文教員的吳節薇獲悉此事，便和學校的同盟會師生商量，向其宣傳婦女解放的道理，鼓勵她要堅強地站起來，反對封建家庭壓迫，與封建的買賣婚作鬥爭，爭取婚姻自由。梁在大家的幫助下，決心離開家庭參加同盟會鬧革命，成為同盟會在澳門發展的第二位女會友。同盟會澳門分會成立後，以海為家的澳門水上居民梁鏡清慨然曰：“吾等水上人家，受盡屈氣，非革命不可！”毅然加盟。起初，他常用自己的漁船秘密為黨人送槍械彈藥接濟內地民軍，後聞孫中山為籌集經費奔走內外，梁有感於此，先後將自己的三艘漁船變賣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三艘漁船變賣後，梁一家生活日趨貧困，但他毫無怨言。此外，他還曉以大義，力勸朋友香山綠林頭目梁義改邪歸正，為革命效力。梁義悅服，遂參加同盟會，率部配合“香軍”活動，還把自己在澳門白鴿巢由義巷11號的寓所作為澳門同盟會人士開會和通訊的地點。

支持孫中山革命的還有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飛南第1861年出生於澳門，比孫中山年長三歲。父為葡人，母是華人，是個典型的混血兒。飛南第幾代世居澳門，在香港法院任翻譯時，認識了當時在香港讀大學的孫中山。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為取得合法執照，曾委託飛南第代為申

請，繼而成為一對異國好友。三十歲時創辦葡文週刊《澳門回聲》及《鏡海叢報》。孫中山亦經常為之撰寫文章。1895年10月26日，中山先生因廣州起義失敗而逃去澳門，飛南第不顧一切對孫中山極力掩護，幫助孫中山從澳門渡海過香港去尋恩師康得黎和律師鄧尼斯。為提防可能被引渡回大陸，飛南第還特意從香港滙豐銀行提取美金300圓交予中山先生離開香港。飛南第除挺身掩護孫中山出走外，還於11月6日在《鏡海叢報》刊登起義之電訊及全文“特錄”，還有經修訂過的孫中山〈農學會序〉。事隔三天，又在《澳門回聲》刊登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文章。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之時，時任澳門議事公局（參議院）議員的飛南第，建議慶祝獲接納，澳葡當局在市政廳升旗舉行大會，隆重慶祝中華民國誕生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元月11日，飛南第在致函祝賀孫中山出任臨時大總統的函中，高度評價了孫中山的豐功偉績，並對中國的革命事業寄予期望，希望孫中山繼續完成“偉大的任務”。信中還提到“素為友好的中葡兩國，在一年內均成為共和國，真是太棒了”。信中字裡行間洋溢着真摯的中葡友誼和表達了中外人士對孫中山的崇高敬意。（該英文信原件現存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辛亥革命成功後，在廣東獨立和新政權成立的進程中，澳門同胞又作出新的貢獻。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傳來，澳門同胞大受鼓舞，澳門一度出現熱烈的革命氣氛。同盟會發起提倡穿華服剪辮子，爭取到一些當地各界上層人士如盧怡若、劉公裕、劉大同等的支持，在澳門當時最大的戲院——清平大戲院舉行“澳門華服剪辮會”，赴會人數逾千，同盟會員在大會上發表演說，已剪去辮髮的人穿着華服到會作示範，受感動而當場剪去辮子的就有百餘人。澳門各界人士還以鏡湖醫院的名義向廣東軍政府捐輸數萬圓鉅款，緩解了廣東軍政府的財政困難。不少熱血的澳門青年報名參加廣東北伐軍，一直戰鬥至徐州前線。

## 前山新軍起義與香山光復

一、武昌起義後香山革命黨人的起義計劃和準備工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槍聲拉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起義迅速在全國引起強烈反應。各省革命黨人紛紛舉起義旗，在以後的七個星期之內，中國十五個省陸續宣佈脫離清室獨立。關內十八省中祇剩下甘肅、河南、直隸三省仍然效忠大清朝。革命烈火已經蔓延，成為不可收拾之勢。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也表示擁護革命，普遍不再懸掛龍旗，而改為懸掛三色旗。祇有一兩家商店仍懸掛龍旗，卻遭到人們的譴責，並採取激烈行動對待。據報導：

歷年香港孔子誕，街間店戶無不遍掛龍旗，今年則絕無僅有，獨海旁妖黨某報，及太平戲院（孔聖會假座於此）掛有龍旗。前月二十七上午，有勞動社會數十輩，群擁至其門首，以石擲之，大聲呼喝，當即除去，群眾始散。尤奇者商號多改懸三色旗，最動目者荷李活道某綢緞莊，懸方長數丈之三色旗，見者咸鼓掌稱贊。噫，龍旗者大清國旗也，三色旗者，所謂大逆不道之革命旗也，乃華僑捨龍旗而懸三色旗矣。<sup>(10)</sup>

隨着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廣東人民也起來回應革命。九月初八日廣州城內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商、總商會等群眾團體齊集愛育善堂討論時局。到會人數眾多，群情激昂。主持人提出的議案是：粵省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吾粵人士萬無模稜兩可之理，就粵省人心趨向，應承認專制政府，抑承認共和政府，以圖永久之保存。請眾表決。與會人士經過熱烈討論，一致認為：舊日專制政府政治勢力已失，共和政府勢力已成，友邦公認，為保存永久治安起見，應即承認共和政府。<sup>(11)</sup>當時兩廣總督張鳴岐雖然覺得清朝大勢已去，但又不願棄舊迎新，遂公開宣佈廣東中立，

企圖拖延時間，觀察形勢，期待變數。對於廣東當局幻想中立的謬論，同盟會員鄭道實撰文給予猛烈抨擊。他在〈廣東中立問題〉一文中明確指出：廣東是中國的一個省，而不是與新舊政府無關的第三者，要麼繼續站在舊政府一邊，平定亂事；要麼與清廷決裂，支持革命，中立是不可能的。一旦宣告中立，舊政府將視為叛逆，而加以制裁，新政府也不會對廣東置之不問，必定揮軍南下，結合人民起義，共同光復廣東。<sup>(12)</sup>鄭道實的文章揭穿了張鳴岐等當局者的陰謀，使香山人民免遭偽裝中立的迷惑和欺騙。

香山人民為革命形勢的到來歡欣鼓舞，革命黨人審度形勢，認為起義時機已至。而當時香山舊政權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武昌起義爆發後，香山及澳門革命黨人積極響應，在澳門組織專門機關策動駐紫前山新軍反正成功。反正的新軍編為“香軍”，對於不久廣東脫離清政府而宣告獨立是十分有力的支持。圖為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中的有關記載。

樾杭阮亦周等至澳門荷蘭園和隆街二十一號設立機關，顏曰樂琴書室。劉思復曾假是寓試驗炸藥炸彈。然成立數月，僅得基本會員數人，不得已宣布解散。丁未冬馮得香山大盜林瓜四之弟瓜五報告，有澳門奸商柯某租用日輪，由日本私運軍械至澳門附近華界海面起陸圖利。即派同志溫子純偕瓜五赴澳。預備劫奪該械後，乘勢在香山錢山聚集起事。其後查悉該輪卸陸地點係在澳門而非華界。恐因此惹起國際糾紛，遂爾中止。是即次年戊申（民前四年）正月廿日發生大交涉之日輪二辰丸所運載之武器也。嗣辛亥八月武昌革命軍起，澳中黨人亟謀響應。時鄰接澳門之錢山駐有新軍一團，早於庚戌（民前二年）正月廣州倪映典反正之役，與同盟會發生關係，至是遂有同盟會員劉忠復林君復莫紀彭鄭岸父諸人在澳組織機關專發動該軍反正。該軍官長何振任鶴年陳可鈺等毅然舉兵應之，為辛亥九月廣東獨立之一大聲援。世稱香軍者是也。要之澳門一地在中國革命史上，其地位遠不如香港之重要，良由該地華僑文化水準低下所致。查該地出版之日報，不獨在民國以前一無所有，即在民國建元迄今三十餘年，亦只見有規模簡陋之小報二種，以較香港大小刊物之日新月異，充斥市閭，相去何可以道里計耶？

入民國後，在粵民黨先後派人至澳門開設分會，擴張黨務。乃因該地僑民缺乏國家觀念，及葡政府種種壓抑，二十餘年來從無特著之進步。然在惡軍閥盤踞廣東期間，革命黨人曾數次利用該地為進取之出發點，亦大有足紀者。一為民五袁世凱稱帝時代，是春肇和軍艦奉令自上海調防粵省，時朱執信主持中華革命黨廣東軍務，李文範古應芬鄧鏗李朗如等佐之。其指揮部設於

澳門華僑與革命運動

七七

起義前夕，石岐駐有清副將一員(俗稱協臺)，率奉領防勇數百名。這些綠營防勇，本毫無戰鬥能力，但副將馬德新(湖南人)頭腦頑固，防勇也多自他湖南老家帶來，號稱善戰。當時，馬德新派防勇把守城廂內外，頗為嚴密，對革命進行最為障礙。除了防營之外，石岐尚有一“縣團練局”，主持人鄭雨初，遊擊隊長為武解元黃龍彰，隊兵約八十人，駐紮在石岐龍王廟；還有縣衙親兵約三十人，由王作標帶領。三人均經鄭彼岸分頭說服，於事前宣誓加入同盟會。

石岐對海的長洲、隆都，村多族大，如谿角劉姓，安堂林姓，南文蕭姓，均為人口逾萬的巨族，華僑甚多，富於民族思想，均經鄭彼岸派人分頭聯絡各族姓的志士和團勇。小欖方面，地方遼闊，綠林最多，其中李就成、伍順添二人，亦早已進行聯絡，約期舉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爆發後，廣東方面香港同盟會總機關，決定先在香山發難。主持這一工作的有香山人林君復、鄭彼岸、林警魂，蕭楚碧、蕭叔鸞，鄭仲超，劉卓棠和東莞的莫紀彭、何振及湖南人任鶴年等。早在武昌起義前，林君復、鄭彼岸等就在澳門南環41號設立機關，召集各地黨人，秘密進行革命工作。當時議定由林君復、林警魂在澳門主持總機關，並由林君復和莫紀彭、何振、鄭仲超等負責策動駐前山的新軍，鄭彼岸負責策動石岐城的防營、團練以及聯絡石岐的紳士，同時先派蕭聘一和蕭世冰兄妹返石岐在正熏街蕭聘一宅設立機關，為黨人會議和秘藏軍火之用。

此外，械彈軍火，乃起義的必需品，主要由澳門、香港兩方面運入。當時有安香兵輪管帶某，是同情革命的，林君復等商得其同意，不時有大幫軍火託他運入。為避免洋關檢查，黃文幹(黃文鐸妹)、蕭世冰十六姑(何振妻，當時未結婚)、劉振群(蕭叔鸞妻)、黃芙蓉等一些婦女同志擔任押運。抵岸後，即由她們乘肩輿將軍火運入蕭宅，或在大涌林家秘藏。這些女同志都勇敢沉着，因此當時雖然巡邏者滿佈街頭，亦無從發覺。

當時擔任聯絡各方面的尚有清舉人高拱元和他的兒子高西平，長洲黃堯軒、黃普明，谿角劉卓棠、劉蔚池、劉日三，龍聚環劉漢華，象角彭雄佳，豪吐高勝湖，申明亭鄉楊藻雲，港頭鄉胡孔初，安堂鄉林少愉、林耀南、林仲達，及南文鄉蕭某等。前山方面有香山籍同盟會員蘇默齋(蘇曼殊之兄)、劉希明、陳自覺(陳景華之弟)等也從日本返回家鄉前山，暗中做地下工作。同盟會員、富商陳芳之孫陳永安，更是既出錢又出力。莫紀彭等通過同窗關係進行策反，很快便控制了駐前山的廣東督練公所新軍。在縣城石岐方面，經鄭彼岸等人活動，香山縣團練主持鄭雨初、遊擊隊長黃龍彰、縣衙親兵頭目王作標均加入了同盟會，從而控制了縣團練和縣衙親兵。他們又派人分頭聯絡各村志士和團勇約期起事。同情革命的安香兵輪管帶還出動兵輪協助把軍火從澳門運回香山，巧妙地避過了海關的檢查。香山起義還得到不少香山籍的海外鄉親、港澳商人積極捐款支持。起義的籌餉工作由同盟會澳門支部機關負責人林警魂擔任，他從港澳商人、海外僑胞中募集了部分活動費用，其中澳門富家子弟、同盟會會員提供了相當多的經費。革命黨人周密的準備工作，保證了香山起義的成功。

## 二、香山革命主力軍新軍起義

武昌首義成功，促使香山起義加快了步伐。這時候，駐紮前山的廣東新軍的反正，成為香山革命的主力軍，保證了香山革命的勝利，而這支隊伍的來歷卻有着十分復雜的背景。

廣東新軍創建於1903年。這一年張之洞奉清朝命令，在武備軍的基礎上整編建成廣東新軍。但官兵的舊習慣重，質素很差，名為新軍，實與舊軍無異。張之洞有鑑於此，乃於建立新軍的同時，籌辦黃埔武備學堂和將弁學堂，培養新軍官以接替舊軍官，實行徵兵制度，徵抽精壯青年入伍以接替老兵。他還認為珠江、韓江三角洲的人民，生活優遊，不夠刻苦，故不在這地區徵兵；而專向其他條件艱苦的地區徵兵。張之洞是想從官兵的挑選和訓練，武器、服裝、給養等方面着

手改善，逐漸把新軍鞏固提高起來，為保護清朝統治效忠的，1905年左右已成立新軍一協（旅），三標（團）共十一個營，人數達六千人。

清末廣東辦軍官學堂和建立新軍的時候，正是廣東革命運動逐漸激烈的時候，但許多武裝起義，都因革命黨人的經驗不足而失敗了。雖然如此，革命的風暴仍方興未艾，黨人從失敗中吸取了教訓，認識到在清軍中發展革命勢力，組織有覺悟的官兵，掉轉槍頭來推翻清朝，是比較容易見效的手段。於是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後，革命黨人紛紛在各省鑽入新軍活動，秘密發展革命力量。凡讚成“建立民國”口號的人就可以加盟。當時入盟的新軍官兵很多，革命黨人趙聲和黃士龍等均任新軍標統（團長）。

有了新軍這支生力軍的加入，廣州的革命氣氛頓時濃厚起來。1909年10月，同盟會領導人黃興、胡漢民與新軍標統趙聲一起策劃廣州新軍起義，不幸走漏了風聲，起義遭到失敗，犧牲十分慘重。但霹靂一聲已予清朝的統治以嚴重打擊，並為辛亥革命開闢了先河。

一般認為，1910年農曆正月，同盟會在廣州發動的“庚戌新軍起義”失敗後，清廷為了省垣的安定，而將剩餘的新軍調到毗鄰澳門的前山城駐防。但事實卻並非如此簡單。除此之外，當時前山與澳葡對峙形勢之緊張，乃是派出新軍駐防前山的決定因素。<sup>(13)</sup>

中葡兩國因澳門劃界的分歧，正在進行談判。可是葡人卻企圖向中國以武力施壓。澳門葡兵，已由三百餘名增至七百餘名，土生葡人更集聚民團百餘名，經常派兵船闖入前山海面遊弋，並擬添置大批軍火，附近鄉民異常驚惶。1910年12月（十一月十五日），葡人名甘時持槍到恭都南屏鄉，槍傷鄉人面部，當即由該鄉巡警將葡人拿獲。與此同時，葡領事又認為中國在澳門灣仔設立漁苗局有背條約，照會廣東總督，要求撤銷。葡人還阻禁前山人民填築海坦圍基，公然宣稱該處係屬澳門海界，始終不允由當地人填築圍基。

1910年7月初，中葡雙方在澳門劃界交涉中

陷於僵局，澳葡竟藉口“剿匪”，用武力併吞路環島。與此同時，澳葡當局又出動兵船強行疏浚前山河道，激起當地鄉民憤慨，強烈要求政府派兵保護。

清政府鑒於香山人民強大的反對澳葡擴張澳門界址的鬥爭形勢，態度也強硬起來。1911年7月，張鳴岐派員到澳門交涉，要求葡萄牙當局立即停止疏浚工程，同時又派二十五鎮參謀官黃士龍巡查澳門附近的防務。<sup>(14)</sup>8月25日，廣東政府向前山增派新軍以後，照會澳葡當局，要求立即停止疏浚行為。<sup>(15)</sup>當時派往前山的新軍為一千多人，還有軍艦四艘，以後繼續增派新軍，最終軍力達二千多人。（據鄭彼岸回憶稱，前山新軍有三千人）。新軍入駐前山，大大增長了人民保衛鄉土的鬥志，大滅了葡萄牙人的侵界氣焰，迫使其立即停止了侵入前山內河疏浚河道之工程。

新軍是高質素的軍隊，充滿愛國和革命思想，不願為腐朽的清政府效力，在革命黨人的爭取下，許多愛國軍官帶領新軍成為舊政權的掘墓人。這支由“廣東督練公所”以西式武器裝備訓練的勁旅，經過廣州起義的洗禮，自標統以下各級軍官，均係陸軍學堂畢業進步青年。其中營長任鶴年（湖南人）是同盟會中堅分子，很快就與澳門同盟會支部取得聯繫。<sup>(16)</sup>

鄭彼岸、何振、林君復、莫紀彭等與任鶴年聯絡後<sup>(17)</sup>，同年11月2日（農曆九月十二日），當小欖起義成功消息傳到澳門時，以前山鎮恭都小學堂（後改稱鳳山小學）為活動基地的黨人蘇默齋（蘇曼殊兄長）、劉希明、陳自覺、陳永安（陳芳孫兒）齊集在陳芳祖居石室內策劃起義；隨後於1911年11月5日（九月十五日）傍晚，在一聲暗號之下，新軍的革命官兵第二次起義開始行動了。前山城遍豎白旗，標統何某倉忙從城牆槌下，向澳門逃去，前山城就在兵不血刃情形下起義成功。次日眾人推舉任鶴年為起義軍司令，何振為副司令，立刻向石岐開拔，配合小欖義軍進攻石岐城。

三、小欖、石岐的起義及與新軍的會師

小欖起義較石岐提前兩三天，於11月2日（九

月十二日)起義。當時小攬鎮有一位局紳何倍樵。他是前清生員，但頭腦比較清醒，平時對清室的倒行逆施的統治深表不滿。聽到武昌首義成功，他立即和當地綠林李就成、伍順添等人，在小攬竹橋頭全記酒米舖秘密會議策劃起義，繳了當地二百多個鄉勇的槍械。這些槍械除了大部分是土打單響以外，其它都是駁殼槍，當時算是新式犀利火器。但們提出的口號是“推倒滿清，有平米吃。”由於統治階級不斷壓榨剝削，土地大量集中，米價飛漲，民不聊生。因此，他們提出的口號得到小攬鎮全體人民的擁護，不旋踵之間，全鎮舖戶豎起白旗響應，熱烈擁護。

5日(九月十五日)，香山知縣覃壽堃聽聞有革軍千餘人在小攬沙活動，便會同李都司及遊擊隊帶兵前往巡視，與革軍發生遭遇戰，被革軍用鴻昌小輪追擊。李都司及遊擊隊便放槍還擊。是時有湖南勇四十名當先衝鋒，結果被擊斃六名，走回八名，其餘不知下落。遊擊隊管帶梁守之部勇被擊斃一名，傷一名。入黑時候，覃壽堃與李都司及遊擊隊敗退回石岐。

第二天，香山協鎮馬德新親自帶領他的軍隊數百名和小火輪數艘，從石岐開來小攬鎮壓人民起義。何倍樵、李就成等率部迎擊馬德新軍於小攬沙口(即渡頭)。由於馬軍士無鬥志，而民軍士氣旺盛，火器又犀利，且得當地民眾的支援，更兼以逸勞，激戰三四小時，把所謂“官軍”打得落花流水，馬德新狼狽逃回石岐，中途被革軍截獲處決。這次戰鬥的結果，清軍死傷四、五十人，而民軍祇傷亡三、四人而已。香軍成立後，李就成的隊伍編為就字營，奉命開赴廣州。

前山新軍起義後，林君復以事機迫切，即日兼程返岐。6日在正薰街蕭宅，召集黨人開緊急會議，決定即日起義。下午隆都方面的各鄉團勇，紛紛集合，浩浩蕩蕩向西河路進發，直趨石岐。其中谿角鄉的民軍，由華僑劉卓棠統率，約有數百人，龍聚環鄉的民軍由劉漢華統率，象角鄉則由彭雄佳統率，豪吐鄉由高勝瑚統率，坎下鄉由梁守統率，港頭鄉由胡孔初統率，安堂鄉由林秀

統率，申明亭鄉由楊落雲統率，南文鄉由蕭某統率，總共不下二、三千人。帶領各鄉團勇的，有的是華僑，有的是學生，有的是綠林豪傑，但事前已收編為鄉中團練者。“沿途絕不驚擾，商民貿易如常，各均放爆竹，歡呼不絕。是時各營勇及縣署、巡勇、遊擊隊等，均表同情。各衙署巡警局及各城樓等，均豎獨立旗幟。商戶亦有豎立者。”<sup>(18)</sup>各隊伍到達石岐後，先在龍王廟集合，分作兩隊，一隊由梁守帶領，由南門入城；一隊由鄭彼岸帶領，由西門入城。當時因馬德新已離開石岐，一時軍中無主，守城的防勇不敢抵抗；縣知事覃壽堃是湖北孝感縣進士，曾留學日本，頭腦稍開明，到任僅一月，見大勢已去，亦不敢抵抗，因此兩隊人馬，遂安然入城。除在南門城頭及縣署擊斃兩名防勇外，雙方並未發生衝突。由西門進入的隊伍，首先就佔領縣衙，王作標帶領的親兵便即投入革命隊伍。縣知事覃壽堃聽到外面人聲嘈雜，知革命軍已到，即時匿避在邑紳洪式文家內，旋被革命軍偵悉，帶回縣署，他表示降服，次日將印信繳出。覃壽堃親自寫了如下申繳文：

前廣東廣州府香山縣知縣覃為申繳事，竊知縣懷抱民族主義，十年於茲，以事勢禁格之故，延誤至今，未有所展。乃者天假之緣，當知縣奉檄出宰之日，值民國軍政府蒞邑之時。知縣為中國計，為前途計，為地方治安計，為同胞生命財產計，均有應盡之義務。現已擔任軍政府事件。所有前縣印乙類，應即備文繳銷，以為與滿清政府斷絕關係之證據。為此備文具申，伏乞照驗施行。<sup>(19)</sup>

革命軍進入縣城後，即派出小分隊，在各街道要隘巡邏，保護人民，並貼出由鄭彼岸等起草的安民告示：

本軍恭行天討，佈告同胞親愛，滿洲以胡亂華，以及二百年外，罪惡貫盈至今，勢如土崩瓦解，各省義師雲起，均是為民除害，還我



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宣佈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後，在總統府與馮自由（前右一）、唐紹儀（前右四）、胡漢民（前右二）等人合影。  
（攝於1912年3月25日）

大好山河，驅逐滿胡出塞，建立共和國，同胞幸福有賴，本軍暨旗起義，人人歡欣稱快。士農工商男女，照常作業無懈。軍到秋毫無犯，不令商民受礙。倘有軍民騷擾，定予嚴責不貸。軍隊紀律嚴明，爾等毋相驚駭。中華民國粵軍軍司令部長佈告。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日。<sup>(20)</sup>

革命軍從覃壽堃手上接收了縣印後，立即派發傳單，通請邑中紳商各界，於五點鐘後，在清鄉善後分所召開會議。各界到者甚為踴躍，並邀請覃壽堃在場列席，隨議定暫借清鄉善後分所為辦事所，仍推覃壽堃為民政部部長，及議定臨時幹事員數十人，公推鄭被岸（當時名岸父）、高拱元和附城一些土紳擔任；同時召集石岐紳商各界，公開組織籌餉，一切部署既定，秩序迅速得到恢復，俟將各部組織完善，再行分部辦事；旋即分派各軍，駐守縣屬各扼要地方，並分派四人往各當道地方演說，安慰居民。當革軍開進縣城時，所有監獄及刑事所、工藝廠各人犯，盡將腳鐐扭鬆，企圖乘機逃脫，後由革軍善言撫慰，始行無事。當時西門大街的振興商店店主人熱心革命，預製了一大批青天白日旗幟，及至起義之日，革命軍旗幟豎在城樓和通衡大道，隨風招展，氣象一新。革命軍司令部宣佈石岐全城戒嚴令：

（一）民間可供軍需之諸物品，一概禁止輸出；

（二）民間所有槍支彈藥、兵器火具，及其他涉於危險之物，本軍司令部得因於時機沒收之；

（三）郵信電報暫行停止，並斷絕海陸通衢之交通；

（四）本軍司令部依於戰狀，不得已時得破壞人民之動產不動產；

（五）寄宿於戒嚴地域內者，本軍司令部因於時機，可使退出；

（六）行政之事，皆歸軍司令部處理；

（七）司法之事，由軍司令長擇判事檢事行之；

（八）集會新聞雜誌等，本軍司令部認為於事勢有妨礙者，得禁止之。中華民國粵軍司令長，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十六日。<sup>(21)</sup>

石岐光復後，當時廣州方面尚未起義，總督張鳴岐和水師提督尚欲頑抗，派江大兵艦，於8日（十八日）開赴石岐，相機收復。不料江大達到石岐海面後，見民軍沿岸設防扼守，聲勢浩大，不敢妄動；相持至下午，前山方面起義新軍全部進抵石岐市郊，革命軍勢力大增，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完全逆轉。兵艦見勢不妙，不敢登陸攻城，祇得撤退回廣州，於是全城秩序人心大定。

起義新軍到達石岐後，立即收編小欖等地的民軍和綠林隊伍，改編為香軍，仍然由任鶴年為司令，何振為副司令，莫紀彭為參謀長。即日由鄭彼岸、林君復等領隊出發支援光復廣州，駐紮廣州西關一帶，嚴密保護市民生命財產，受到廣州市民的熱烈歡迎。未幾，又改編為北伐軍，隨姚雨平北伐。至南北議和後，始告解散。<sup>(22)</sup>

#### 四、香山人民反軍閥鬥爭

清廷退位以後，袁世凱便轉身扼殺革命，在派人刺殺宋教仁的同時，從帝國主義手中大借外債作為鎮壓革命黨人的軍費，篡奪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1913年秋，袁世凱安排他的爪牙軍閥龍濟光當廣東省都督。龍濟光入粵後，秉承袁世凱的旨意，為加強對香山的控制，特派袁帶以一個旅的兵力，進駐香山，解散縣議會，恢復清制的部分政制，開放賭禁，鎮壓革命人士。士兵不時騷擾居民，洗劫商店，嚴重影響地方治安。作為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的孫中山的家鄉，籠罩在白色恐怖中。

1914年，老同盟會員朱執信以澳門為根據地，召集同盟會員、綠林朋友與之進行鬥爭。當時朱執信主持中華革命黨廣東軍務，李文範、



大總統孫中山參加廣東烈士追悼會（攝於1912年3月5日）

古應芬、鄧鏗、李朗如等人充當助手，其指揮部則設在澳門。他們聯絡了大批轉移到澳門的老同盟會員，奔走於珠江三角洲一帶，以發動綠林為主，策劃討龍軍事鬥爭。

朱執信安排林警魂在香山策動討龍。林警魂吸收了一批中華革命黨的新黨員，以香山革命黨人為骨幹，組織了一支討龍的部隊，包括香山二區（今沙溪）的李萬、梁有，三區（今小欖）的林五、林泗，八區（今斗門）的趙慕澄、趙煜林，五區（今三鄉）的黃章、黃義等近一千人，決定在八區黃楊山舉行武裝起義，但因走漏風聲，被龍濟光派駐香山的縣知事厲式金、縣護沙統領袁帶率領兵丁、員警一千多人前往圍捕，導致起義失敗。

1915年春，原《香山循報》記者、編輯李銳進、劉善餘、黃冷觀、劉誦芬、毛仲瑩等人在《香山新報》上撰文討伐龍濟光，均被龍的爪牙拘捕、

解赴廣州。毛仲瑩大罵審員，被害於越秀山下。其餘各人直到龍濟光被驅逐出廣東後方才獲釋。

1916年春，香山人民再度爆發聲討龍濟光起義。4月9日晨，林警魂率民軍從二區出發，向石岐推進。龍威艦長楊藻雲（香山二區人）率（龍威、龍飛、龍翔）三艦，從獅窖河出發，直指縣城。當民軍進至馬山、西河路時，遭到截擊，二區民眾為援民軍運送彈藥、糧食補給，絡繹不絕；殺雞宰豬，到戰地慰勞；而在水路，三艦剛入石岐水域，就遭到猛烈截擊。楊藻雲下令發炮還擊，將敵軍火力壓住。然而，守軍卻集結兵力，搶佔高樓，以居高臨下之勢，用密集火力猛掃河上三艦。龍威艦冒着炮火強行駛靠岸邊，戰士楊桂手握駁殼，一馬當先，躍到岸上，不幸中彈犧牲。楊藻雲還擬率隊繼續搶灘。突然艦上的油箱被擊中着火，楊藻雲也中彈犧牲。龍飛、龍翔兩艦邊作戰邊將着火的龍威艦拖出戰場。但因

火勢過於猛烈，艦上官兵們祇好跳水離艦，隨同兩艦撤退。陸路民軍因水路受挫，孤軍苦戰至傍晚，也祇得暫行撤退。這場戰事，犧牲的將士有楊藻雲、楊桂、劉草堂、劉拱星等共二十六人。

4月下旬，駐香山的龍濟光部隊的納順洪旅易幟反正。同時，林警魂亦統領民軍進逼縣城。邑紳梁鴻洸等則穿梭調解，最後起義軍同意讓納順洪旅於5月初以不繳械的方式撤離香山，林警魂等隨即率民軍進城，在香山重建革命政權。

1927年，美洲香山華僑集資，於石岐孫文中路西山公園內，修建了一座“殉國烈士紀念碑”，又稱“討龍紀念碑”，以紀念1916年討伐龍濟光戰鬥中犧牲的二十六名香山烈士。

1920年冬驅逐廣州軍閥陸榮廷、莫榮新之役中，香山革命者駕駛的轟炸機起了重要作用。當時中國尚無空軍，但有幾名香山人在美國培訓飛行員畢業回國，他們是楊仙逸、張惠長、李光輝、陳慶雲等人。楊仙逸奉孫中山之命在美國發動僑胞籌款購得十二架飛機，分別運到菲律賓和澳門。1923年1月，因急需飛機打擊陳炯明叛軍，楊仙逸等經過周密策劃，決定先把放在澳門的飛機拆成配件運回廣州，當裝載飛機配件之輪船駛入廣州起卸後，迅速把飛機裝配。<sup>(23)</sup>與此同時，孫中山派張惠長、陳慶雲前往澳門與利古洽談購買水上飛機事宜。澳門商人盧廉若獲悉，主動出錢購買大鴨婆機一架送給孫中山，增強粵軍飛機力量，積極支持孫中山驅逐桂系軍閥。之後，孫中山籌得一筆款項，陸續購買了利古的另五架大小鴨婆機。當時，澳葡當局惟恐捲入中國內戰，不准革命軍使用澳門水上飛機場。國民黨元老朱執信為了使這支年輕的空軍早日建功，奔走於虎門、香港、澳門之間，親自策動虎門要塞司令丘渭南反正。於9月中旬，在虎門建立了第一個空軍水上機場，又在澳門招聘兩名美國飛機師史密斯和維納，以及十名中國籍地勤人員。這支隊伍在隨後的戰鬥中表現十分出色。9月26日（農曆八月十五）深夜，楊仙逸偕兩名美國飛機師駕駛着大鴨婆機，張惠長獨駕小鴨婆機（兩架飛機均裝上

炸彈）飛往廣州觀音山，在空中向莫榮新的軍隊駐地投下三顆炸彈，嚇得岑春煊、莫榮新等狼狽逃跑。第二天清晨，叛軍即退出廣州，經三水向廣西撤退。孫中山的軍政府遂得以重返廣州。

#### 五、香山革命的意義和影響

辛亥革命時期香山人民經過艱苦奮戰，推翻了本縣的封建統治，其後又驅逐入侵軍閥，建立了民主新政權。文化上的破舊立新，也取得重大進展。同一時期，香山人民又通過頑強抗爭，制止了澳葡擴張前山界地的侵略活動，維護了鄉土安全。同時創建香洲商埠在摸索新城市發展經濟方面，也進行了有益的嘗試。這些香山人民所經歷的重大事件，今天回顧起來，仍深深感受到其震撼作用。總之，香山辛亥革命是全面的，因而也是典型的一次革命。香山人民通過這次革命，衝破了封建主義的桎梏，漫步前進。雖然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反封建的任務尚未完成。但新社會已經建立起來，歷史開始進入了新的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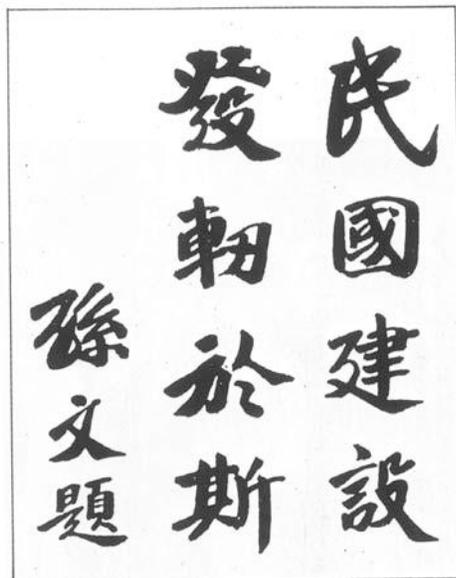
偉大的香山革命波瀾洶湧，革命精英站在風口浪尖奮勇前進。從啟蒙時期鄭觀應敲響警世鐘，到容闈出洋留學求真理，孫中山高舉革命大旗，十次反清起義，無數香山革命戰士出錢出力，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為了推翻清朝專制統治而奮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革命進程中湧現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人物：捐軀共和第一人陸皓東被捕後，面對敵人戳指敲牙的嚴刑折磨，寧死不屈慷慨就義；空軍之父楊仙逸率領其家族捐獻的飛機組成戰機大隊，英勇奮戰，為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海軍司令程璧光、航空局長張惠長、香山起義的組織者劉思復、鄭彼岸、林君復、林警魂等人的英勇鬥爭。孫中山胞兄孫眉、鄭仲、陳耀垣、唐雄等親友變賣牧場和家產支援革命；香山旅日華僑、音樂家蕭友梅，集畫家、文學家於一身的蘇曼殊，旅澳華僑先施公司創始人馬應彪，永安公司創辦人郭標，孫智興、馬玉山等人，他們都是辛亥時期傑出的革命志士。此外，唐紹儀和梁如浩等留美學童也投入民國營壘，唐紹儀出任民國首屆國務總理，梁如浩

擔任外交總長，成為與時俱進的風雲人物。

革命勝利後，許多香山起義的領導人具有功成身退，不圖名利，祇求做大事，不願做大官的精神。鄭彼岸領導石岐起義成功後，謝卻出任縣長，率領香軍到達廣州，參與完成廣州光復事業後，隨即悄然離去。林君復也是起義領導人，到達廣州後，被推舉為副都督，卻推辭不任。伍廷芳、廖仲愷亦曾推舉他為農商部長等高級官職，也都婉辭。孫中山為此而書贈其“毀家紓難，功成身退”條幅。其後他在惠陽象山古寺削髮為僧，長居古剎，布衣素食。劉思復則自從清朝鼎革後，解散支那暗殺團，拒絕參政，無意仕途高陞；然而，其思想則從激進民主主義轉向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另一極端。1914年7月他在上海成立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主張經濟上、政治上絕對自由。據說他這一轉變源於看不慣革命後官場上的爭權奪利；但無政府主義祇是一種空想，否定了政府的存在，何來共產主義的實現？無論如何，香山革命前輩的革命精神及其高風亮節，堪稱後世之楷模，永遠彪炳於史冊。

#### 【註】

- (1) 〈興中會組織史〉，馮自由：《革命逸史》，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四集，頁2-4。
- (2) 〈興中會會員人名事蹟考〉，馮自由：《革命逸史》，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四集，頁24-63。
- (3) 當時與容闈一道出國留學的還有黃勝和黃寬等人。黃勝（1827-1902），1847年與一年後因健康原因回國，後從事新聞出版工作。黃寬（1829-1878）在美國中學畢業後，由美轉英，入愛丁堡大學讀醫。1857年獲醫學碩士學位，成為第一個中國西醫。他為推動西醫東傳貢獻了畢生精力。
- (4)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頁235-236。
- (5) 張永福：《南洋與創立民國·緒言》，頁1。
- (6) 蔣祖緣、方志欽：《簡明廣東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618。
- (7) 〈孫總理修正倫敦被難記第一章恭註〉，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頁125。
- (8) 〈澳門華僑與革命運動〉，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頁72-73。
- (9) 〈同盟會四大綱領及三民主義溯源〉，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頁203、220頁。初建時孫中山提出建立中



國革命同盟會，經討論去掉革命二字，以利活動，但委任狀仍保留革命二字。天運為洪門會年號，說明二者之間的關係。

- (10) 《香山旬報》第121期。
- (11) 粵人集議承認共和政府詳誌《香山旬報》第一二二期，辛亥九月初十日頁79。
- (12) 道實：〈廣東中立問題〉，《香山旬報》第123期。
- (13) 〈澳門華僑與革命運動〉，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頁75。
- (14) 鄭勉剛：《澳門界務錄》卷四，〈廣東諮議局呈請督憲阻止葡人浚河及張督答諮議局文〉。
- (15) 鄭勉剛：《澳門界務錄》卷五，〈黃土龍稟陳澳界情形〉。
- (16) 〈澳門華僑與革命運動〉，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頁75。
- (17) 鄭彼岸：〈香山起義的回憶〉，《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31-237。
- (18) 革命軍佔領邑城詳記《香山旬報》第123期，辛亥九月十七日。關於香山起義日期，有人說是11月5日，但據本文報導和戒嚴令所署日期，應為11月6日。
- (19) 鄭彼岸：〈香山起義的回憶〉，《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31-237。
- (20) 革命軍佔領邑城詳記《香山旬報》第123期，辛亥九月十七日。
- (21) 革命軍佔領邑城詳記《香山旬報》第122期辛亥九月十日，頁79-80。
- (22) 鄭彼岸：〈香山起義的回憶〉，《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31-237。
- (23) 〈澳門華僑與革命運動〉，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頁75-76。